

东北军的内争与西安事变： 以少壮派为中心^{*}

王春林

内容提要 1934年归国后，张学良决心改造东北军，少壮派趁势崛起。先天的偏见与现实的利益使少壮派和元老派纷争不断，但两派都忠于张学良，而张学良较亲近少壮派，对元老派则相对疏远。西安事变中，元老派和少壮派实现了短暂的分工合作，前者支持张学良的行动，后者则是“扣蒋”的实际执行者。事变善后时期，少壮派忠于张学良和仇视元老派的思想愈演愈烈，他们因而将营救张学良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元老派，最后酿成二二事件。东北军少壮派的兴衰既与张学良“联共抗日”理念的发展相始终，又与他们同元老派的内争缠绕在一起。少壮派的派别偏见不仅影响了历史走势，还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得到充分发挥，但这些都远离了历史真相。

关键词 东北军 西安事变 张学良 少壮派 元老派

东北军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支持者，东北军少壮派和元老派^①的派别纠葛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演变与结局影响甚大。对西安事变的研究，目前学界一方面集中于事变的起因、意义与结局的探讨，另一方面集中于西安、南京与中共等国内外力量以及蒋介石、张学良、周恩来等关键人物的应对。^②从东北军视角考察西安事变来龙去脉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探讨张学良从整军

* 拙文撰写中，张万杰、王惠宇两位老师惠赐资料，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① 少壮派主要是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应德田曾详细罗列了少壮派主导的抗日同志会的名单，参见应德田著，岳龙、王秦整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5—66页。元老派主要指东北军高级将领，包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以及参谋长董英斌。

②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司马秉乾：《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版；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香港，利文出版社1989年版；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出版公司1995年版；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还可参阅廖良初、郭燕海《近十年西安事变研究述评》，《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于丽、田子渝：《台湾地区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化世太：《近十年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人物研究综述》，《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4期；占善钦：《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研究的难点热点问题》，《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

抗日到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对少壮派与元老派的矛盾分歧仅略有涉及。^① 稍后的研究多专注于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且研究视域也多集中于西安事变及其善后。^② 近年来,有学者对二二事件的影响以及中共与少壮派的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但对元老派与少壮派关系的研究仍相对薄弱。^③

事实上,东北军元老派和少壮派的矛盾纠葛可以追溯到1934—1935年的武汉“剿匪”时期,其间张学良的角色也很微妙。而在现存两派的文本资料中,少壮派与元老派各执一词,甚至误导了部分研究者。本文拟以东北军少壮派为中心,辨析少壮派壮大过程中与元老派的权力争夺,体察两派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角色差异与矛盾演化过程,展现少壮派的派别偏见对西安事变历史走势及其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

一、张学良改造东北军与少壮派的崛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大部退往华北,沦为一支流亡关内的地方势力。1933年热河抗战时,张学良有意抗击日军,但东北军不堪大用,张学良也不得不下野出洋。^④ 1934年初,张学良自欧洲归国后有意整合东北流亡势力^⑤,期望能够团结一致地实现收复东北的目标。在武汉,他甚至联络过与他有隔阂的东北籍国民党中央政会委员齐世英等人。^⑥ 张学良的部下也注意到其精神面貌的改善,其时从事东北军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栗又文表示:“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与前判若两人。谈话之间流露出锐意革新之意。”^⑦ 东北大学学生应德田亦见证了张的变化:“他是那样强健,神采奕奕,风度雍容,他诚恳和气的态度,也一扫以往那种浮躁冷漠加上骄傲的作风。”^⑧

张学良抗日准备工作的重点是改造东北军,在经过流亡关内与“剿匪”作战后,他感觉彼时的东北军难以承担抗日复土的使命。“他认为要驱逐日寇,就要富国强兵;要复土雪耻,就要把东北军整顿好,使之成为充满朝气、能够担任抗日工作的劲旅”。因此,张学良很重视考查各级军官的军容风纪、军事知识、政治倾向等情况,希望通过吸纳有抗日志愿的青年来驱除东北军的暮气。^⑨ 同时,张学良还有意从东北流亡学生中选拔干部,他曾表示:“要改造东北军首先要培训基层军政

^① 参见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428页;张魁堂:《张学良传》。

^② 参见罗玉明、杨明楚《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内部矛盾——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人文杂志》1991年第6期;丁孝智、王明星:《“二二”事件的起因究竟是什么——与李云汉、武育文等先生商榷》,《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李海英:《试论西安事变中的东北军少壮派》,《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③ 参见郝银霞《对西安事变善后处理中“二二事件”的再认识》,《民国档案》2007年第2期;张万杰:《有关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刘东社:《张学良、中共与“抗日同志会”关系发微》,《学问》2016年第6期。郝文认为二二事件对抗战大局有积极影响;张文指出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与少壮派的密切关系以及宗派倾向;刘文对抗日同志会的创建、第二党倾向、与少壮派的区别、组织弱点,以及对中共的教训做了细致的阐释。

^④ 参见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第253—272页。

^⑤ 该势力形成于九一八事变后,主要指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政势力、流亡学生、知识分子等。相关研究参见拙文《大义抑或利害:西安事变中东北流亡势力的反应》,《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中央与地方的角力: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的国立改组》,《史林》2012年第4期;《国难中的九一八纪念——以东北流亡民众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

^⑥ 沈云龙、林泉、林忠胜:《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191页。

^⑦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栗又文等从事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在东北军中都有公开的身份,张学良甚至要求他们效忠。参见刘东社《张学良、中共与“抗日同志会”关系发微》,《学问》2016年第6期。

^⑧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8页。关于应著的偏颇之处,高崇民之子高存信等曾专文批驳,参见高存信、白竞凡《评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39页。但应著作为记述少壮派源起、发展及其与元老派斗争态势的自传性史料,其价值不容忽视。

^⑨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9页。

王春林 / 东北军的内争与西安事变：以少壮派为中心

干部。师长以上的可暂时不动，团以下的要逐步更换。东大同学基本可当营、连级干部，东中的可当班、排长，这样我们就可掌握全军领导抗战。”^①可见，张学良此时希望通过培养具有抗日思想和军事能力的青年军官来改造东北军，使之成为以他为中心的抗日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东北军少壮派应运而生。少壮派的核心人物是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苗剑秋以及孙铭九。应德田与孙铭九、苗剑秋“一见即能倾心吐胆”，他们拥有“共同的激昂的抗日思想”“和积极整顿东北军的心愿”。^② 他们对内要求整军，对外要求张学良联共抗日，最终目的是为了复土还乡。但三人的特点也不尽相同。苗剑秋概括了他们各自的角色：“我有主张，应德田有头脑，他制订计划，孙铭九是个实干的人。”^③孙铭九的定位则是：“我只是一个军人，文化不高，没有水平，不能替他出谋划策、分忧解难。苗剑秋也有水平，但讲话走火得厉害，不像应德田那样深谋远虑。”^④可见，三人中应德田是领袖，孙铭九负责执行，苗剑秋负责宣传。

对于如何整顿东北军，应德田曾在1934年7月到武汉拜谒张学良时提出：要“加强爱国思想和抗日思想的教育；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加强纪律宣传和管理；加强勤俭刻苦的锻炼。改变过去行为粗野、纪律松懈、技术不精、作风浮荡等将骄卒惰、腐败堕落的状态。尤其必须注意精选军官，军官是军队的中心骨干，是表率”。^⑤孙铭九也按照张学良的要求调查东北军军官的军纪、人事等情况。^⑥

少壮派在东北军迁往陕甘后逐渐聚拢，他们多怀有整军抗日的思想。从事东北军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宋黎发现“东北军抗日复土愿望虽然强烈，但多带自发性。连、营级军官，不仅数量不足，政治素质也很差，旧军队习气甚浓，而且多受‘攘外必先安内’影响”。他“提出应及早办千人规模的陆军学校，以培训东北军抗日骨干”。^⑦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孙达生也曾向张学良进言：“最迫切的问题是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新干部的培养问题”。“要想东北军永保心齐、有发展，必须有自己培养干部的军政学校”。^⑧

但在张学良身边怀有整军抗日、收复失地思想的却不只少壮派，张学良的旧属以及东北大学学生等东北救亡人士亦抱着这种想法集中到西北。^⑨在时人眼中，他们是鼓动他联共抗日的重要力量。东北籍国民党人钱公来指出：“张汉卿自离开北平，他的底下人许多失了业，譬如王卓然他们就加入了人民阵线，有人还说他们加入了共产党，这班人早已钻入陕西张汉卿的幕下，自命为东北军的新派，日日怂恿张汉卿左倾。”^⑩记者斯诺(Edgar Snow)亦了解到，“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1935年12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后，他传话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学生，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来。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抗日宣传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独在陕西，他们却受到了鼓励和保护”。^⑪

然而少壮派却对张学良身边的旧属具有先天的排斥感。应德田认为武汉“剿总”吴家象、周达

^① 粟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78页。“东大”指东北大学，“东中”指东北中学，两校为东北流亡势力的一部分。

^②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31页。

^③ 詹姆斯·贝特兰著，何大基等译：《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5页。

^④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32页。

^⑤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1—26页。

^⑥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22—26页。

^⑦ 宋黎：《难忘的一九三六年——怀念校长张学良将军》，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6页。

^⑧ 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25页。

^⑨ 参阅张万杰《救亡图存东北魂：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⑩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45页。张学良，字汉卿。

^⑪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夫等人“大多是闭口不言抗日救国，只顾顺口搭音地说一说拥蒋‘剿共’，实际上是一些只图作官作吏，以求保住安逸生活的人”。他主张整顿东北军中存在的为数不少的“反动、保守和不得力的军政干部”。^① 东北大学代校长周鲸文与应德田声气相通，他也表示：主张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被我们视为苟安之徒，不肯与之为伍，在东北军人中，我们愿接谈的也属于积极抗日派”。^②

二、东北军的内争与张学良的亲疏之别

在少壮派眼中，元老派是张学良整军的主要障碍。“有些高级将领与他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他要改造、振兴东北军，一些下级军官、包括中级军官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却要触动一些高级将领的利益”。“再如，联共抗日问题，有些话张可以同应德田、刘鼎等人商议，但却不敢对高级将领直说，怕有阻力，甚至怕他们泄露出去”。^③ 与元老派王以哲关系密切的高崇民亦指出：“应的主观愿望，是消灭东北军的旧人，变成以他为主谋的新东北军。他这个去旧换新的企图，曾向张学良公开建议过，张在新陈代谢的理论上，基本上同意应的主张”，“但张认为不能操之过急”。^④ 此外，元老派与少壮派在职位升迁上亦存在激烈的竞争。时任五十三军六四七团团长的吕正操写道：“万福麟反对我升任师长，他和缪澂流背着张学良，把我送到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同时，由缪澂流去西安见张学良，借口已送我入学，而力保其亲信刘元勋接任了一一六师师长”。“张学良知道在河北的五十三军万福麟老而无能，又担心发生变故，决定派黄显声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准备取而代之”。^⑤ 彼时张学良在人事上显然更尊重元老派的意见。应德田抱怨道：“张学良将军原拟调一一六师师长缪澂流为副军长，王以哲将军力保，改为五十七军军长”。“张学良将军欲任一〇五师团副王甲昌为团长，因师长刘多荃反对而作罢”。^⑥

少壮派的改造锋芒甚盛，使张学良的旧属颇感压抑。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的黎天才不堪其扰，“孙铭九一伙人，常以不肖之心来衡量我，有时在张面前飞短流长，使我无法忍耐下去……某次，我趁张去南京开会，一怒而归返故乡，此（后）张返陕，知我已去，曾对这种人大发雷霆，乃函电交驰，催我回去”。^⑦ 从事东北民众救亡运动的王卓然亦深有同感，张学良“说他身边缺一个可靠的人，要我接替米春霖作办公厅主任。同时西安的空气，分成左右两派，情形复杂，我是个怕事的，不善于斗争的，立时感觉自己不胜重任”。^⑧

少壮派的“整军”主张无可厚非，但他们将矛头指向元老派，并无视元老派在东北军中的作用就未免有些偏颇了。在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笔下，王以哲“是少帅最得力的帮手，是他最可信赖的部属。他从北大营当连长起，到团长、师长、军长，都是少帅一手提拔培养的，他对少帅忠心耿耿”。“由于他与少帅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他什么话都可以向张讲，军机要事，张也总是叫他去办”。“在联共抗日的问题上，他起了一定的作用”。^⑨ 与苗剑秋一同前往西安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James

^①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6—27、78页。

^② 周鲸文：《周鲸文回忆录》（手稿复印件），东北大学校史志办公室藏，第920—921页。

^③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59—60页。

^④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49页。

^⑤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2页。

^⑥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78页。

^⑦ 黎天才：《黎天才自传》，转引自罗健《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第158—159页。

^⑧ 王卓然：《自传》，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抚顺市顺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王卓然史料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⑨ 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85页。

Bertram)则听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有人说王以哲“是反动分子，他反对急进的少壮派，但我老听人说，他是真正的抗日分子。”^①1936年夏，周鲸文在西安亲见应德田冷待王以哲，他严厉批评道：“你是副司令身旁最亲信的人，你这种态度就是给副司令得罪人，要副司令替你担过，这叫什么助手”。“你这种态度不是帮助副司令，不是做政治工作，而是瓦解东北力量，暴露自己的弱点”。^②

新老两派的矛盾令张学良等人颇为头痛。张学良曾向旧属、天水专员卢广绩表示：“我们内部（指总部的东北人员和东北军），近来新旧老少之间常闹意见分歧，互不团结，很不好，希望你来后能做些团结工作。”王以哲却“希望我最好不要来总部，搅在一起，做不了什么事”。^③张学良自然希望新旧部下同心协力，他虽然知道旧部“思想落后，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进步”，对少壮派的激进主张，他也会严厉批评。应德田曾“提出象何柱国这样的人，不仅应当撤职，而且还应该杀掉，张马上表示反对”。张学良责备应德田：“过去咱们是那样的人，人家来和咱们共事，现在你要革命了，就把人家都搞掉，真是岂有此理！”^④但张学良的调和做法却令两派均感不满，王以哲“感到张学良举棋不定，并有些偏听青年人的意见”。^⑤一〇九师六二七团团长万毅则认为：“张学良在抗日方针上现在还不坚决。他仍在动摇。如果他要成为真正的领导人，就应该迅下决心。领导者应代表下面的意志，东北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一致要求立即抗日，领导必须实现士兵们的共同愿望，否则士兵就会不管上面命令自行行动”。^⑥

少壮派和元老派的矛盾在张学良创建军官训练团和抗日同志会的过程中更趋恶化。1936年6月末，张学良在王曲创办了军官训练团，任命王以哲为教育长。在应德田笔下，王以哲充满野心，他“倡导的内容，都是蒋介石在庐山军官团所讲的那些东西”，并且“把他的亲信和他认为可靠的人塞进训练团当了干部。在训练团中，他还酝酿拥王代张的空气，使大家对他很为不满”。但张学良的解说却完全不同，张指出了王的思想落伍，却没有抛弃王的意思。“王军长在团里好讲‘大学之道’，这不是我的意思。他对抗日有些消极”。“他认为现在共产党已经要联蒋了，我们就不必再进一步联共了。王军长他不懂我们东北军在联共抗日运动中的重大作用”。^⑦在孙铭九笔下，王以哲对张的抗日理念也不甚理解，王曾表示：“以前在东北时不抗日，日本人进攻热河时不抗日，现在来到了大西北，离鬼子那么远，却讲抗日了，怎么抗呢？！”^⑧可见，王以哲似乎有些跟不上张的思路，而少壮派的说辞则明显带有派别偏见。其后受少壮派拥戴的黄显声接任教育长^⑨，黄“积极主张抗日，工作尽心负责，张学良将军很放心”。^⑩吕正操亦证实：“各种活动的积极开展，使训练团一扫旧东北军中颓废落后的习气，代之以生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这一切，使张学良感到格外振奋”。^⑪

少壮派在训练团中很活跃，但是因为训练团是公开的团体，所以诸如“联共抗日”的主张只能私下讨论。传播联共思想主要是由时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刘澜波和应德田等人“分头

^① 詹姆斯·贝特兰著，宋淡秋译：《中国的新生》，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页。

^② 周鲸文：《周鲸文回忆录》，第943—944页。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副司令。

^③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④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79—80页。

^⑤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88页。

^⑥ 万毅：《万毅将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⑦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9—60页。

^⑧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72页。

^⑨ 关于张学良以黄显声接替王以哲出任教育长的经过，参见张万杰《有关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⑩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4页。

^⑪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第51页。

向各个学员谈话实现的”。^①因为在思想上更接近,张学良在军官训练团之外又秘密建立了抗日同志会,据应德田记述:王以哲在训练团的作为“引起张学良将军、刘澜波、孙铭九和我等人的警惕和气愤,立即讨论和研究对策,认为东北军的情况是:思想进步的,无权;有权的,不进步。这对进行联共抗日工作有极大的阻力,应当提拔一批思想进步的年青军官担任高级职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要能够全面地明确掌握东北军的思想动向。”^②应过于强调该组织的反元老色彩,未免有失偏颇。孙铭九就指出了该组织“抗日复土”的宗旨:“为了能在东北军内形成一个坚强的抗日领导核心”。^③卢广绩亦指出:抗日同志会是“为了在东北军内部培养具有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坚定意志的新生力量”。^④但在应德田等人的主导下,该组织在发展会员时仅以少壮派为主,元老派无形中被排除在外。应德田曾表示:该会会员“都是经他慎重考虑选择东北军中营团长坚决主张抗日者,还有在副司令左右积极抗日的知识分子”。^⑤孙铭九也提到了入选的两个条件:“一是拥护联共抗日这一根本政治主张;二是张将军身边信得过的人,大部分是青年军官。”^⑥

在应德田笔下,张学良与他们关系亲密,“孙铭九、苗剑秋和我三个人组成一个小中心,在张学良将军的直接领导下,在东北军中进行了大量的联共抗日活动。”张学良对三人“理解”“重视”“信任”,他们对张学良则“始终敬爱”“忠心耿耿”。^⑦周鲸文亦证实:“应兄这时已是张先生最信任的干部,他辅佐张先生决定很多事务问题。”^⑧但事实上,张学良在重用少壮派的同时,也很了解他们的缺点。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表示:“我是因为东北军暮气沉沉,没有朝气,用这些青年,是为的振奋人心。不过我知道他们的长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我用他们的长处,制服他们的短处,有我在,他们决不敢胡闹。”^⑨孙铭九亦见证了张学良对苗剑秋的谨慎使用,“张学良由于锐意改革,对于有才华的青年人,总是礼待有加,对苗剑秋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总觉得他讲话锋芒毕露,脾气太犟,容易闯祸,所以虽然乐意把他留在身边,却一直未敢委以重任,背后叫他‘苗疯子’”。^⑩

军官训练团中多为以少壮派为主的青年军官,抗日同志会更无王以哲等高级将领。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事实上对少壮派较为亲近,对元老派则相对疏远。元老派将领对此多有不满和不安情绪,万福麟在致函王树常时表示:“兄前以副座左右青年用事,疏远老成,曾一再函谏,均未蒙复。”^⑪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在致中央的信中亦报告称:王以哲“回避和张左近的进步青年见面”,“他竟公然同张的亲信天水专员卢乃庚谈称,张先生初回国时,主张拥护中央,现在又反抗中央,这不仅是背叛信义,而且这样冒险行动引用积极分子,是十分容易地(把)东北军的团体生命断送了”!^⑫事实上,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联共抗日活动中,王以哲曾扮演重要角色,东北军同中

^①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2页。

^②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4—65页。

^③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74页。

^④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89页。

^⑤ 周鲸文:《周鲸文回忆录》,第938页。

^⑥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74页。

^⑦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6—67页。

^⑧ 周鲸文:《周鲸文回忆录》,第936页。

^⑨ 洪钫:《我所知道的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⑩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33页。

^⑪ 《万福麟等忠告张学良》,天津《大公报》,1936年12月16日,第3版。电文中万自称兄,副座指张学良。王树常时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原东北军高级将领。

^⑫ 《刘澜波给中央的信》(1936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存,档案卷:373:7,转引自张万杰《有关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第156页。卢广绩,字乃庚。

共的联系，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面，都是通过王以哲安排的。只是张学良亲近少壮派的做法影响了王以哲的积极性，加上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介入，因而王以哲始终被排除在抗日同志会之外。^①但元老派与张学良仍然维持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张学良对元老派也尽力团结。他表示：“事情如何演变，还未敢定，真的打起仗来，是要扛枪的人去打的。”^②而王以哲虽然感到张“不信任他”，但对于同国民政府方面的交往情况他“都如实向副司令报告，自矢忠于副司令决无二心”。^③

西安事变前，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已经势如水火。张学良力图调和双方，一致对外，但收效甚微。同时，尽管两派矛盾日渐加深，但他们仍奉张学良为共主，张学良尚能震慑住双方，尤其是少壮派。在张学良统率下，少壮派还不至于有过激举动。

三、西安事变中少壮派与元老派的分工合作

为应对蒋介石即将发动的新一轮“剿匪”对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三位一体^④的冲击，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依靠的是东北军全体，元老派与少壮派都是参与者。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曾知会过身边的人，其中既有元老派的王以哲等，亦有少壮派的应德田、孙铭九等。12月8日下午，王以哲密告刘多荃道：“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⑤11日晚11点，张学良向应德田等人阐述了兵谏的原因，并提到缪澂流在总部坐镇，应德田这时才知道“他已和军长们谈过这件事了”。发动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在一间屋子里指挥军事行动”，“文人聚集在另一间屋子里”。张学良让黎天才和应德田等文人“起草一篇八大主张的通电稿，准备把蒋介石抓到后向全国发出。经过研究，稿子最后由黎天才拟出，大家看过，略作修改，于十二日抓蒋后发出”。^⑥因此，宋子文到西安后感觉到，“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⑦事变后成立的参谋团中，东北军的代表皆为元老派将领；而设计委员会中，东北军的代表既有少壮派应德田以及与其较接近的刘澜波、卢广绩，亦有高崇民、黎天才、洪钫这些张学良的旧属。^⑧事变中张学良在军事部署上较倚重元老派，而少壮派则多担任宣传与保卫工作，这反映了他们的地位差别。

扣蒋行动方案是在高级将领中商定的。刘多荃写到：11日晚，“我们被召集到副司令公馆。先到的有王以哲、缪澂流、我、孙铭九、白凤翔、刘桂五。副司令命我到米春霖家将于学忠找来”。张学良宣布扣蒋行动后，“我们即分别按计划开始行动部署”。^⑨孙铭九证实：“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不知去何处外，其他高级将领均来了。”张在表达了兵谏意图后，“在场的人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⑩可见，事变时高级将领至少在行动上都是支持张学良的。事变中，元老派曾向被扣中央大员表达了不满情绪。缪澂流向晏道刚抱怨道：“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

^① 参见张万杰《有关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94页。

^③ 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15页。

^④ 指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军事同盟形式，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

^⑤ 刘多荃：《扣蒋前夕》，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13页。

^⑥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91—94页。

^⑦ 张俊义译：《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第18页。

^⑧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01—103页。

^⑨ 刘多荃：《扣蒋前夕》，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13页。孙铭九时任卫队二营营长，白凤翔为一〇六师师长，刘桂五为一〇六师团长。

^⑩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104—105页。

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①万耀煌亦记道：“何柱国、王以哲两人来谈，大发牢骚，诉说东北军的苦经，中央对东北军剿匪损失毫无补充。又说蒋委员长不纳忠言、不抗战等语。”^②王以哲部创办的《东望》也对蒋介石激烈批评：“蒋委员长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总理的伟大，而迷信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猖狂；忽略了民众的要求，而崇拜个人的功利……蒋委员长刚愎自用，以致处处失策，不能不负着这个重大的责任！”^③

而扣蒋行动主要由少壮派掌握的卫队营担任，由刘多荃和白凤翔等将领负责指挥。白凤翔和孙铭九分别对卫队营做了动员，其讲话亦反映了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拥张抗日”的意愿。白凤翔的副官常国宾写到：白表示“蒋介石不抗日，还把抗日的张副司令扣起来了，卫队营的任务，是保护长官的安全。在场官兵听到这个突然的消息，无比愤怒，有的都哭了。白师长接着说，我们要把蒋委员长请到城里换回张副司令，但不要伤害他”。^④而白的参谋长汪熔却没有提到“张学良被扣”这个细节，只强调“使我们东北军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都是蒋介石一手所造成的。现在他又利用红军来消灭我们。今天是大家报仇雪耻的时候了，要奋勇杀敌，为东北军人洗刷不抵抗的耻辱”。^⑤当事人孙铭九则回忆，“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将军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⑥孙的记述较合情理，“营救张学良”的说法虽然逻辑上有些混乱，但极易激发部队的战斗热情。孙铭九的部下张化东、商同昌都见证了她的动员。^⑦

西安事变大大激发了少壮派的革命热情。斯诺写到：蒋介石的生命危险“最可肯定的还是来自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自有着不满情绪的桀骜不驯的士兵，来自有组织和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都要求在如何处理总司令的问题上有发言权。少壮派军官通过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和他的僚属。部队的情绪肯定是赞成把总司令干掉的”。^⑧高崇民亦指出：“无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里的中下级官佐，因蒋十多年的反革命，祸国殃民，万恶滔天，无不恨入骨髓，故颇有人主张把他枪毙。”^⑨而中共的放蒋以及保持其威望的立场也令东北军少壮派“极其费解”，“因为这些少壮派原来以为共产党是第一个要蒋介石的命的。他们有的人真的因为这种‘叛变’而气得哭起来——因为他们仰望共产党给他们政治领导，共产党对他的影响不下于张学良本人”。^⑩

在张学良忙于和平解决事变时，东北军元老派与少壮派都表达了各自的意见。设计委员会认为“蒋介石不做出可靠保证，不能匆忙草率地放他。甚至有人说，如果蒋介石不听话，就干脆把他干

^① 娑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03页。

^② 郭廷以、沈云龙等：《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369页。

^③ 《“一二·一”革命火爆发》（1936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④ 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32页。

^⑤ 汪熔：《刘桂五扣蒋纪实》，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36页。并且白凤翔讲话的口吻与孙铭九相似，因而笔者推断常国宾将二人讲话内容混淆。

^⑥ 孙铭九：《临潼扣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18—219页。

^⑦ 参见张化东《华清池捉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78页；商同昌：《扣蒋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38页。

^⑧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26页。

^⑨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30页。

^⑩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33页。

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宋子文，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才能让蒋走，否则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① 12月24日，宋子文获悉：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席间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为我轻易劝服”。^② 张学良为此在送蒋离陕之前分别向少壮派和元老派做了交代。12月24日晨，“张召集卢广绩、黎天才、应德田等人开会，讨论放蒋问题（但未提出送蒋的话），应德田根本不赞成放，他说，放就是纵虎归山。高崇民主张放也可以，必须有把握。张当场一一解答，最后大家基本上表示同意放蒋”。^③ 张学良同日又召集王以哲、董英斌和何柱国三人，“密告送蒋的决心。三人均阻之，最后建议至多送至洛阳。张嘱咐，关于联军军事听命于杨虎城，关于东北军军事听命于于学忠”。^④

在事变之初，张学良曾表示：“重要事情要和重要干部详细讨论。遇到重要事件，虽限于事实困难，不能和很多人讨论，但至低要和重要干部讨论，俾干部得以竭尽忠诚，发挥己见。”^⑤ 张学良在发动事变时获得了东北军上下的支持，也实现了预期效果；但其为了结事变“送蒋返宁”的做法既为部属一致反对，也使其个人与东北军面临窘境。

四、事变善后时期少壮派的偏执与二二事件

张学良“送蒋返宁”后，东北军元老派继续推行和平解决的方针，而“革命”热情高涨的少壮派则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围绕南京方面的指令与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双方矛盾逐渐激化。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随蒋介石离开西安。当晚，张学良由洛阳致电西安，请杨虎城释放陈诚等4名大员。东北军元老派与少壮派对此态度截然相反，应德田认为：“扣留在这里的蒋方军政人员和飞机是副司令回来的可靠保证。”王以哲则表示：“副司令有电报指示，我们怎能不办呢？”“委员长已经走了，我们再留这些人毫无意义，送人情送到家嘛，这是副司令的精神”。^⑥ 可见，元老派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少壮派则持谨慎的态度，而少壮派的主张显然具有一定影响。卢广绩就认为：“我总觉得应的话有一定道理，而王以哲的话有些感情用事。”^⑦ 此时杨虎城在其间的态度举足轻重。在孙铭九笔下，杨虎城完全受制于元老派。^⑧ 但孙的言说未免有夸大之嫌，卢广绩描述了杨虎城的反应，“杨听了应的话，有所踌躇，但说，我已经下了请柬，约定今晚举行便宴欢送，变更似不大好”。^⑨ 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也证实：“杨说，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张叫放就全放了吧！看他的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造成困难。”^⑩ 显然，杨虎城的态度多半出于主动。

其后的“放飞机”问题与之类似，少壮派又将矛头指向元老派。应德田指责道：杨虎城认为张学良“不回来就不应当再放了。但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没关系，‘送人情送到家嘛’。杨虎城将军无奈，只得同意”。^⑪ 但在高崇民笔下，这些都是由三位一体决定的。“张学良送蒋时在飞机场即面嘱

①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139页。

② 张俊义译：《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第20页。

③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35页。

④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1934—1937）》，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6页。

⑤ 张学良：《“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0页。

⑥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37—140页。

⑦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96页。

⑧ 参见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154—155页。

⑨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96页。

⑩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57页。

⑪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40页。

杨虎城把大员们放回。张送蒋抵洛阳后，又给杨电报，嘱释放大员，经三位一体讨论，同意释放”。^①参与斡旋的东北救亡人士阎宝航亦证实：“当我传达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踊跃。杨虎城看过张学良的信后表示，‘这没问题，飞机给他们放回去’。”^②

彼时双方形势已发生根本逆转，贝特兰指出：“既然少帅以唐吉诃德式的热情把他抓到的人放掉了，而且陪同他回了南京，那么，起事者就一举把自己手中最大的王牌丢掉了，把最有价值的人质放弃了。”^③因此，少壮派关于“放走大员与飞机”的言论明显有夸大、偏执之嫌。孙铭九引用阎宝航和刘海山的话攻击元老派^④，但这种由其个人提供的史料的可靠性是很令人怀疑的。而且阎宝航、刘海山的话也只能反映彼时瞬息万变的局势和蒋介石因势利导的应变，并不能证明西安方面应对的失误。

少壮派对元老派的仇恨早已深入骨髓，现实的分歧更加剧了他们的猜疑与偏执，因此，一些片面的信息极易打动他们。应德田写道：1937年1月11日，顾祝同的代表“祝绍周与王以哲深谈很久。据说，在谈话当中，祝绍周曾向王以哲表示了南京的意思，许王以哲江苏省主席、何柱国安徽省主席之职”。^⑤孙铭九亦执着于“大员、飞机与营救张学良”之间的狭隘逻辑，而这种逻辑竟然源自张学良说过的话：“我送他回去，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在咱们手嘛，你怕什么”。“你不要担心，我不会有事的，你忘了这里还有他们呐（指陈诚等大员和飞机）”。^⑥张学良或者说过类似的话，但这种逻辑则多半仍是少壮派的主观臆断。因为扣押大员和飞机并不能促使国民政府释放张学良，事实上此时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于如何处置张学良考量更多的是国家纲纪与统一。^⑦

在奉命释放飞机和大员的同时，东北军将领在单独或与杨虎城联名的函电中都坚持要求释放张学良。1937年1月5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张学良公权，并令其早日返陕，“张副司令一日不来，即军民一日不安”。^⑧1月8—11日，杨虎城又连续致电蒋介石恳求放回张学良，以缓解中央军西进引发的群情激愤。^⑨而蒋介石深知张学良在东北军与三位一体中的地位，急欲乘机挟张以解决之。1月7日蒋介石在致电负责前方军事的刘峙、顾祝同时就谈到了利用传单劝说、分化张杨官兵，“可用张名义代制，劝导其部属服从中央，接受命令，乃为救国自救惟一之出路等意。用最合情理、最简单文字，使其官兵离心，失却战斗力”。^⑩张学良在1月7日致函蒋介石时关于自己的行止提出两种方案，意欲帮助国民政府将东北军调出整理。^⑪但在经蒋介石修订后的方案中均未提及张学良的行止，仅在乙案提到“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在豫鄂皖之东北军”。^⑫1月10日，蒋介石又致函

^①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34页。

^② 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36页。阎的消息来自宋美龄。

^③ 詹姆斯·贝特兰：《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第17页。

^④ 参见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158、144—145页。刘海山为张学良的副官。

^⑤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50页。顾祝同时任西安行营主任，负责对陕甘的军事善后，祝绍周时任巩洛警备司令。

^⑥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140、142页。

^⑦ 参见《蒋介石日记》（未刊本），1936年12月29日，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215页；冯玉祥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62—870页。

^⑧ 《杨虎城请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公权并令其返陕电》（1937年1月5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3页。

^⑨ 《杨虎城请求蒋介石撤退西进大军并释放张学良密函电》（1937年1月8—11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04页。

^⑩ 《蒋介石关于对陕策略及准备进攻西安军事部署致刘峙顾祝同电》（1937年1月7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92页。

^⑪ 参见《张学良为解决陕甘问题致蒋介石函件》（1937年1月7日）附：《张学良意见书》，《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6—97页。

^⑫ 《蒋介石修订的解决陕事之方案》（1937年1月），《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7页。

杨虎城假意安抚，“关于汉兄行止……今几经曲折，办到特赦，而国府有管束之令，一涉法纪问题，即难以个人感情立时补救”。“稍假时日，必为之设法，使仍有效力革命之机会，以无负其爱国之苦心”。^①

在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少壮派因循忠于张学良以及仇视元老派的思路，使东北军自缚手脚。这时张学良的指示在东北军两派中的反应完全不同。1月9日，从事斡旋的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监察委员吴瀚涛带来张学良的信，“着重说明要以抗日救国为重，应当和平解决”。但应德田在接受这些指示时却仍执着于张学良个人：“他能回西安，自然就和平解决了，也就是以抗日救国为重了。”^②元老派则多数主张和平，两派分歧难以调和。10日前，王以哲拜访王化一，“力主和谈，切盼副司令归来”。晚间，孙铭九来访，“他说：东北军，尤其少壮军人，一致要求张副司令回陕，否则不惜一战，胜则实行原主张，败则加入红军”。^③高崇民亦指出：少壮派“分头到东北军的前线，与各带兵官相约署名签字，宣誓对南京方面顶着干，以争取张学良之释放。而东北军上层的文武官员和红军方面都认为打起仗来无异于送张学良的命，而且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相违。这样，东北军中就形成了上层主和、下层主战的局面”。^④

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内部纷争是颇为担忧的。1937年1月初，国民政府拟派王树常往西安代替张学良管理东北军。张学良得知后立刻说：“不行，非我回去不可，杨虎城一定维持不住，军队一定要出事，王树常是好人，一去一定要受收拾的。一定要我回去。”^⑤此时东北流亡势力上层主要担忧的也是少壮派。1月12日午后，东北军代表米春霖到达南京，即同在南京的杜重远、王卓然、莫德惠、刘哲等交换意见，认为“东北军要避免分化，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同时“要注意少壮派可能冒险行动，破坏和谈”。^⑥13日，张学良致函东北军将领表示：“委座之意，东北军彼始终受[爱]护，决不歧视。但在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绝难挽此劫运。弟一时不能离京，也不便离京……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⑦张的去函明显针对的是少壮派的偏执主张。

这时东北军元老派在与国民政府方面谈判时仍坚持要求释放张学良。1月14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表示：“此间人士，均渴盼张副司令返陕主持一切”，“钧座欲谋释群疑，脱责难，示宽大之怀，策西北之安，似应速令张副司令返陕”。^⑧同日，蒋复函杨虎城强调：“此时如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⑨1月16日，东北军将领鲍文樾等又携带杨虎城私函前往南京，杨建议由张学良继续主持陕甘。^⑩何应钦对此极为反感，他表示：“陕方意见如此，似已牵入容共及陕甘特殊化问题，中央势难予以采纳也。”^⑪蒋介石亦强硬回绝西安方面的要求，“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

^① 《蒋介石关于张学良行止及派兵西进暨解决陕事条件等问题致杨虎城书》(1937年1月10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10页。

^②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49页。

^③ 王化一：《为了事变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④ 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74页。

^⑤ 郭廷以、李毓澍、陈存恭：《戴翼翹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104页。

^⑥ 王化一：《为了事变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文史资料选辑》第111辑，第113页。杜重远为东北名流。莫德惠与刘哲为奉系时期就任职于东北的元老。

^⑦ 《张学良为蒋介石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函》(1937年1月13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17页。

^⑧ 《杨虎城关于解决西北四问题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月14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19页。

^⑨ 《蒋介石告诫杨虎城勿再提张学良回陕函》(1937年1月14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20页。

^⑩ 《杨虎城关于派员呈送解决陕事方案致蒋介石函件》(1937年1月16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8—99页。

^⑪ 《何应钦关于陕方代表提出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及红军分驻陕甘等条件致孔祥熙密电》(1937年1月18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32页。

能之要求”。^①蒋介石还指示顾祝同要在谈判中坚持这一原则，“张副司令之出处与名义，须待西北问题完全解决时另定之”。^②但西安方面仍在坚持。1月21日，杨虎城召集东北、西北两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再派李志刚前往南京、奉化。23日，张学良对李志刚表示：“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转告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可以利用我在东北军中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③这时西安方面立场虽有松动，但仍在努力。当天，西安方面即致电张学良：“副司令既暂难回陕，请给一名义，以维系东北军心。”^④蒋介石复电安慰称：“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⑤至1月26日，东北军的态度已有些低声下气。他们“要求先发表张之名义而后移动。此并非即欲张回去之意，实因部属朋友感情关系，不能不顾。如中央将此点办到，即照所定办理”。在被顾祝同拒绝后，何柱国又提出“撤兵至渭北后发表张学良名义”的折中建议，但顾祝同与蒋介石仍不退让。^⑥

此时东北军内部混乱而复杂，“高级将领大体均可接受命令，但对下级不能不妥为运用”。“设计委员会方面，由吴家象去疏通，尚无结果，政训人员正在阻挠，军官中亦有态度甚恶者，均为下级居多”。^⑦然而元老派在少壮派面前仍有些摆“老资格”，何柱国“和王以哲等几次和‘少壮派’军官们争论，企图说服他们，说服不成便加以斥责。结果他们不但不服，反而散布‘王以哲、何柱国投降中央，受贿若干千万元’”等不实之词。^⑧高崇民亦对元老派主导的谈判颇有抱怨：何柱国“不知照顾少壮派的情绪，甚至连民主的形式都不采取”。“他和杨虎城对于设计委员会与参谋团两个组织，都置之不理。例如派米春霖去南京，又派徐良、谢珂等先后到潼关谈些什么，以及何柱国每天在电话上与顾商定些什么，都没有把问题提出，让大家知道或讨论过。大家都不清楚，这样自然招致少壮派们的疑惑”。^⑨少壮派对元老派的努力则完全不买账，他们的情绪日渐激烈。苗剑秋认为：“东北军高级长官都很不好——除了张司令，都是坏蛋。他们只想到自己的福利，只想怎样保持自己的禄位。”他们对王以哲和何柱国的仇视亦达到极点。“他们是西北的叛徒，他们出卖了我们。孙铭九说非打死他们不可”。^⑩

这时张学良也颇感焦躁，他连电西安方面进行劝说。^⑪1月29日，为统一东北军的意见，王以哲召集东北军军官在渭南举行会议。在会上，何柱国“先撤兵再谋救张”的主张遭到应德田的驳斥，应“为救张不惜一战”的主张极富鼓动性，最后全体参加者形成决议并签字。^⑫但事实上大量军

^① 《蒋介石指斥杨虎城等提出的解决陕事办法为“割裂军政破坏统一”函》(1937年1月19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35页。

^② 《蒋介石关于杨虎城谈判六项意旨致顾祝同密电稿》(1937年1月22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42页。

^③ 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46—348页。

^④ 《杨虎城于学忠等呈述执行甲案实际困难并提出六项要求等文电》(1937年1月23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37页。

^⑤ 《蒋介石告东北军将领在部队未移防完毕前勿提张学良复权问题的密电》(1937年1月27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51页。

^⑥ 《何应钦关于顾祝同继续与米春霖等会谈情形的电话报告》(1937年1月26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48—150页。

^⑦ 《何应钦关于顾祝同继续与米春霖等会谈情形的电话报告》(1937年1月26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49页。

^⑧ 何柱国口述,施文淇等整理:《何柱国将军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172页。

^⑨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42页。

^⑩ 詹姆斯·贝特兰:《中国的新生》,第213,242—243页。

^⑪ 参见《张学良促前方各将领接受“移防命令并依限撤退电》(1937年1月27日)、《张学良关于陕事情按蒋意旨及前方商定办法实施致于学忠等函》(1937年1月29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51、153页。

^⑫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71—181页。

王春林 / 东北军的内争与西安事变：以少壮派为中心

官是被应德田的意见所裹挟的。高崇民指出：“刘多荃虽出席会议，亦未发言，其他带兵官们也很少有发言的，会上简直没有讨论，更无人肯把前线实际情况加以说明。何柱国在东北军官中，本无威望，会场上各带兵的军官们都被应德田借口争取张副司令的话所控制，无人敢表示赞成何的意见。”^①中共代表刘鼎证实：“会议开得很紧张，争吵很厉害，双方各持己见”。“争的结果是要打。会后各不服气，实际上是各行其是”。^②因此，很难说渭南会议能代表众意，而至多只能算作是少壮派官兵意见的集中表达。而这种意见自然需要东北军高层的权衡与确认，因为脱胎自奉军的决策传统始终是“将领主导”“下级服从上级”，而非这种“全体军官会议”的形式。应德田在回忆中指责道：“如果在这次会议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能光明磊落地把自己的想法认真谈出来，经过坦率交换意见、透辟的分析，是能够取得一个求大同存小异的一致决议的。”^③但当时两派早已势如水火，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少壮派攻击元老派的主张“纯粹是梦话，也可以说是破坏抗日势力的鬼话”。“显明是汉奸卖国的行为，是消除异己的阴谋，还配谈到抗日吗”？^④彼时少壮派眼中只有张学良个人，根本没有国家大局。应德田在多年后仍认为：“双方都不是为了重开内战，就南京方面来说，是放张与否的问题；就西安方面来说，是如何争取张回来的问题。”^⑤

渭南会议后，少壮派视会议决议为东北军全体的意见，元老派则试图以东北军上层乃至三位一体的决策否定少壮派的意见。经过劝说后，何柱国认为青年军官已接受撤兵等安排。“只待于孝侯由兰州来，再向他们说一次话即移撤”。^⑥1月31日，于学忠飞抵西安，他随即听到了来自元老派和少壮派的意见。当晚在王以哲家举行了三位一体最高会议，东北军参加者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以及应德田等少壮派军官。鉴于东北军内的不同意见，“会场呈现出少见的长时间沉默”，最后于学忠表示：“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应该按照鼎芳和柱国的意思办！”于学忠赞成元老派的意见，东北军以及三位一体也就主和达成了一致。^⑦

渭南决议代表了很多少壮派军官的意见，元老派仅以代理统帅于学忠的命令否定之，使少壮派感到难以接受。孙铭九表示：“原先希望于学忠会赞同先争取张学良回来的主张，而现在表示的却是相反意见。”^⑧应德田亦回忆道：“我在旁听的时候，心中只是对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违背渭南决议、出卖张学良将军的行为感到无比气愤，对张学良将军的部下采取这种手段感到莫大痛苦”。^⑨会后，元老派也未能认真安抚少壮派。何柱国写到：王以哲“那时病情很重，加以对‘少壮派’的估计不足，认为他们不过是闹闹而已，是不会动刀动枪的”。^⑩然而于学忠向东北军干部传达三位一体

①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51页。

② 刘鼎：《谈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1979年编印，第308页。

③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04页。

④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处（解放社）：《告东北军将士书》，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2月3日，第1版。应德田即为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处处长，此文告又极似应的论调，因而该文告可视为少壮派在一二·九事件前后对时局的宣言。而该文告较之应的回忆录显然更能反映彼时少壮派的思想动态。

⑤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48页。

⑥ 《何应钦转报顾祝同与何柱国谈判东北军移撤及陕甘主席人选等问题的电话记录》（1937年1月30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54页。于学忠，字孝侯。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于学忠即返回兰州坐镇。

⑦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83—185页。王以哲，字鼎芳。

⑧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177页。

⑨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11页。

⑩ 何柱国口述：《何柱国将军生平》，第174页。

体的决定时,少壮派群情激奋。^①

2月2日,少壮派在悲愤情绪下枪杀了王以哲等人,意图坚持不撤兵,营救张学良。二二事件引发了东北军的内讧,元老派刘多荃等回师报仇,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被迫逃走,其他军官多被惩处或打压。其后,东北军听命东调,日渐式微。

五、结语

东北军少壮派从形成伊始到西安事变前后都对元老派抱有偏见,时过境迁后他们依然在其回忆录中重复着过往的逻辑与仇恨。他们在历史情境中的偏见又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被充分发挥,这样的历史本身就充满着构建痕迹和主观色彩。少壮派同元老派的矛盾源于他们的“整军抗日”主张以及部分元老派军官的落后。但事实上元老派王以哲等人亦是张学良“联共抗日”与西安事变的参与者,两派并无本质区别。高崇民就指出:“有政治野心,无政治方向,被反动派挑拨操纵的少壮派,除根本就是反动分子混入我们队伍的而外,其初多半是出于热心爱国,但逐渐变成个人英雄主义者,甚至有变成个人利害的盲动者,因而一再犯严重错误,遂至身败名裂”。^② 少壮派虽有所谓革命热情,但在政治上却难免失之幼稚,他们对外反蒋,对内则反对元老派。然而蒋介石与东北军元老派却是张学良和中共倚重或统战的对象,因此少壮派实际上对国内政局和东北军内部都缺乏清晰的认识。毛泽东曾细致剖析了以孙铭九为代表的“左倾幼稚病人士”:“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怒,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份[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③

历史的发展是多条线索并进的,西安事变也是各方矛盾与冲突集中爆发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经历了热河、长城抗战,鄂豫皖、西北“剿匪”等阶段,流亡军队的处境使该部逐渐萌生“联共抗日”的思想,东北军内不同阶层对前途亦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东北军少壮派从改造东北军起家,逐渐发展到与元老派争权,事变前两派已经势如水火,事变后斗争更加白热化。西安事变与两派的纷争是紧密缠绕的,两派的支持促成了事变的爆发,两派的矛盾也导致了东北军的瓦解。东北军少壮派的兴衰大体与张学良的“联共抗日”理念的发展相始终,他们较好地扮演了推手和践行者的角色。因而他们也是全民族抗战的推动者之一。但他们仅接触到“联共抗日”的皮毛,而并未超脱旧军阀派系的封建思想,因而始终无法摆脱派系之争,也难以对时局做出合理反应,最终因手段过于激烈而不容于东北军与国民政府。同时,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少壮派,作为东北军内的“左派”力量,他们要为东北军的瓦解负责,但彼时张学良尚且应对乏术,遑论更加缺少历练的少壮派了。

[作者王春林,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参见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第184页;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88页。

^②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64页。

^③ 《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3页。